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历史盛衰论卷

庞天佑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历史盛衰论卷

庞天佑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历史盛衰论卷 / 庞天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211-07813-4

I. ①中… II. ①庞…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9934 号

##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历史盛衰论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LISHI SHENGSHUAILUN JUAN

---

作 者：庞天佑

责任编辑：史霄鸿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7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813-4

定 价：6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 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 年 10 月

# 题 记

吴怀祺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发展深受西学的影响，史学走上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史学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史学理论的命题、框架，发掘出新材料，重新解读古代传统史学，去思考，去争论，去写作和研究。比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真实，历史能不能提供借鉴，等等。中国史学家渴求新知，在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上，竞相展示自己的才华，提出各种看法，这本无可议论，但另一个普遍现象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原有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盛衰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西方学者赞赏这样的观点：历史“不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生产者，而是一般规律的消费者”，宣称是上帝主宰历史。<sup>[1]</sup>有的说：“物理学着眼于规律，历史科学致力于特殊。”还有的谈到历史学的意义，说：历史只能陶冶心智，“历史也不能够预言将来；它也不能提供一套无处不可适用的规律来作为政客的指南；它不能够用历史类比的演绎法指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任何争执中哪一方是正确的”<sup>[2]</sup>。对于这些看法，研究历史盛衰论，将会得到我们民族史学自己的答案。

[1] 参见威廉·德雷：《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202页。

[2]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185页。



历史学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安邦兴邦的借鉴，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sup>[1]</sup>安邦兴邦的实现，总是受一定的历史观与历史思维的支配。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于我们进行历史总结，进而治国、理政，有重大意义。

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易变”的思想，发展了《尚书》《春秋》的历史借鉴观。司马光说到作史的缘起，谓：“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sup>[2]</sup>

司马光把“稽古”“师古”，即借鉴历史，与治理现实，即“资治”，联系成一个整体，说：

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sup>[3]</sup>

“稽古”与“资治”相一致，根本点是，总结历史以安邦、以兴邦，追求太平盛世。胡三省对司马光的资治观十分推崇，指出这样的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歟！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卷末。

[3]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二《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

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sup>[1]</sup>

传统史学历史借鉴观没有只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借鉴的教条上面，而是以辩证的通变观念，把历史借鉴思想推向新的高度。

王夫之系统地读了《资治通鉴》，但他认为司马光没有以变化的眼光讨论历史的盛与衰，说：

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sup>[2]</sup>

“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可说是抓住了司马光历史盛衰论重大缺失。王夫之以《周易》的通变思想，说明“历史借鉴”，不是照搬前人、别人的经验，不是机械地吸收前人的教训，一切都要注意条件。王夫之说：“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sup>[3]</sup>据此，王夫之提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他说：

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sup>[4]</sup>

治理国家要有通识，可以说，这是王夫之带有结论性的认识。他又说：

[1]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

[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文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4] 《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一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



“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sup>[1]</sup>仅此，我们可以体察到传统史学思想中的历史盛衰论的重大理论价值。

本书系统地展示了传统史学中历史盛衰论的丰富性和各种形态，剖析各种盛衰论在理论上的意义。这里有必要就涉及历史盛衰论的几个重要理念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再作说明。

——忧患意识是历史盛衰总结的自觉。古代史家重视总结历史盛衰，导源于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在时代大变动中形成的，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充实。忧患意识体现出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对社会的理解，对历史发展走向的思考，体现出他们对历史盛衰辩证的清醒认识，以及他们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

《尚书》是一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教科书，它以三代的历史表明人君治理好社稷，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即人们说的殷鉴史观。忧患意识是殷鉴史观的核心，正如《酒诰》中说的“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鉴厥命，我岂可不大监抚于时”。《春秋》也是一部忧世的有为之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春秋》写作意图，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周易·系辞下》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忧患意识作了解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在此前一章，还有以“子曰”方式进行解说的，可以摘录一段：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所以，对忧患意识形成有体系的论述，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之一，它激发着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读史、写史、论史，思考历史的前途。

与忧患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居安思危的观念，也就是司马迁“见盛观衰”的思想。历史的盛与衰，辩证地成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变动。《旧唐书·魏徵传》载魏徵给李世民上了四封奏疏，中心内容要李世民鉴前世败亡相继的教训，居安思危。其中第三疏说：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

贞观十二年（638年）九月，太宗与大臣有一段对话：

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

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sup>[1]</sup>

[1]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二年。

在社会危机发生时，谈历史借鉴，可以理解，而在歌舞升平时，能注意到“盛”世之下，有“衰”的因素，有这样的意识，确是“四海之福”。

历史盛衰论的研究，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思想意识上的、社会风俗上的，还要注意到一国之盛衰又是与周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盛衰相联系的，这可以说是“盛衰连环论”（陈寅恪语）的表现。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观念，更提醒我们要以这样的理念，处理各种纷纭复杂的形势，争取人类的美好前途。

——人才理念与历史盛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突显了借鉴历史的重要性，但他盛衰论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人才思想。他把对人才的重视，提高到治国的首要位置上：“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sup>[1]</sup> 这在古代史学家 中是相当突出的。

《资治通鉴》总结出的安邦的经验，要把“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作为政策措施的依据，要以民为本，但要落实这些，关键是人才，“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观念提出，是其历史盛衰论的核心。

将《资治通鉴》与《稽古录》联系起来看，可知司马光是把人君与人臣作为人才体系提出来的。其中如何用人、知人为用人之本、人才系统中应有不同的人才、用人论贤不论亲疏、用人“当容其短，收其所长”、用人不疑等，在司马迁看来，都会影响历史盛衰的变动。

当然，司马光的人才论，有局限性，他只是说到人才的发现与发挥人才作用方面的问题，至于人才培养问题以及相关的教育问题，司马光没有系统的思考。

——义利观念与社会的发展。义利观是古代的社会价值观，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社会风俗。风俗关乎盛衰，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史学家、思想家很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周易》开篇是“乾之四德”，是做人做事的原则。这四德是“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做一切事，一开始就要有好的观念。求利，要认识这个“利”是“义”之“和”也，离开“义”去追逐“利”，不符合《周易》的精神。《乾·文言》又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利最为称道的，是“以美利利

[1]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魏纪五，明帝景初元年。

天下”，这是求利的最终目的。

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义利观成为民族大义观、历史盛衰观、社会变革观的内在依据。孔子说：“见利思义”<sup>[1]</sup>。“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sup>[2]</sup>。“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sup>[3]</sup>。

司马迁看到“趋利”“求富”是历史运动的动因，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sup>[4]</sup>

但追逐财富，又影响社会的风气。《货殖列传》说“重赏”“财用”在风气变化中的作用，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把它分别排列写在下面，可以看得更清楚：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耳。

今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1] 《论语·宪问》。

[2] 《论语·阳货》。

[3] 《论语·里仁》。

[4]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史家讨论历史盛衰之所以然，注意从风俗文化角度，论历史的盛衰，也就是看到不同的义利观思潮的出现，是社会盛衰的风向标。

司马光有一段较长的评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社会安定，三代以后，风化之美，没有若东汉之盛，“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而和帝以后，社会风俗衰败，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但由于还有“光武、明、章之遗化”，有士人抗争，立私论以救其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但不幸的是没有明君振作，到了桓帝、灵帝，风俗更加败坏，“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他联系社会风俗，看一代的盛衰变动，得到深刻的教训，说：“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sup>[1]</sup>

——太极学说与社会历史的理念。这就把古代历史盛衰论，提升到哲理的高度上。周敦颐的太极说为建构理学大厦，体现六经、《论语》《孟子》的要义，夯实了地基。朱熹视为理学的纲领。朱熹门人说过：“故尝谓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sup>[2]</sup>朱熹进而以《易》之理气说，以阴阳交感的变动，解释历史治乱兴衰的道理：“孔子之辞，说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须是以身体之。……若论阴阳，则须二气交感，方成岁功。若论君子、小人，则一分阴亦不可，须要去尽那小人，尽用那君子，方能成治。”

太极学说是以“诚”为本的和谐理念。通过对“诚”的阐发，赋予“理”以新的内涵。周氏的《通书》是与他的太极“图”相表里，表明“诚”，即所谓太极也，并由此讨论了天下治乱的理念。《通书》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因此，中国传统历史盛衰论，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进入

[1]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建安二十四年。

[2] 参见《朱子语类·原序》

到哲理的层面。凡此，在《中国史学思想会通》这套书的相关部分，会做出进一步阐释。

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忧患意识，体现出的是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要求我们有新的视野。

从天人方面来说，是如何使社会发展与自然更为和谐地统一起来。古代“究天人之际”的任务，现在是有新的内容，这也是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从天人的角度、从人类发展的要求出发，思考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条件之间的各种联系与矛盾。

从全球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不安宁的世界，世界对我们的发展既有有利的方面，又存在许多矛盾，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严峻的挑战，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往察来。另一方面，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是全球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保持忧患意识，更显得重要。

我们的各项事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潜在的危机，又是客观的存在。这要求以忧患意识去思考，及早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去处理好。

总之，传统史学中的历史盛衰论，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传统历史盛衰论，吸纳其精华，为的是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庞天佑教授多年来从事历史思想的研究，治学勤奋，多有发明。在这卷书中，他系统论说了中国思想史上历史盛衰论的发展和变化，在各个时期的内容和特点，进而思考它们对历史发展的大势产生的影响。在论说人才观时，作者看到重视人才和摧残人才对历史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这是辩证的思考。

我想，在读完本卷后，人们对于历史能不能提供借鉴，历史盛衰论的总结有没有意义之类的问题，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本卷撰述的旨趣所在。

# 目 录

## 题 记 / 1

### 绪论 历史盛衰总结的传统与意义 / 1

#### 第一节 殷鉴思想的渊源及其形成 / 2

一、从恪守先祖训诫到以史为鉴 / 2

二、殷鉴思想的渊源及其形成原因 / 8

#### 第二节 “疏通知远”与“彰往察来” / 12

一、古与今相联系的观念 / 13

二、孔子的古今观念与修史 / 18

三、战国诸子古今观的思考 / 21

#### 第三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资鉴与资治的理路 / 25

一、着眼现实需要，立足施政实践 / 26

二、对史学目的与史学方法的影响 / 28

三、历史发展与历史认识的无限性的意蕴 / 30

#### 第四节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历史盛衰考察的思路 / 32

一、追源溯流，全面考察历史 / 33

二、辩证分析，审视盛衰兴亡 / 35

#### 第五节 “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以史经世的立意 / 40

一、从以史为鉴到以史经世 / 40

二、施政总结与时代要求 / 44

三、理论意义与哲学思维 / 46

## 第六节 “据古鉴今，以立时治”：立足现实，探求治道 / 49

- 一、观古今之成败，寻沿革之理路 / 50
- 二、总结治国之道，以求施政兴邦 / 53
- 三、察究治乱之原，因应盛衰之运 / 56

## 第七节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精神 / 58

- 一、立足现实，铭记历史 / 59
- 二、顺乎时势，超越前人 / 61
- 三、开阔视野，救亡图存 / 64

## 第一章 “究天人之际”：历史盛衰考察的总体观念 / 69

## 第一节 天与天命思想 / 70

- 一、自然之天与天命决定论 / 70
- 二、天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 / 73

## 第二节 天命思想的演变 / 75

- 一、西周时期的天命思想 / 75
- 二、春秋战国时期天命思想的变化 / 78
- 三、秦汉时期天命思想的流行 / 83
- 四、灾异论、祥瑞论与循环论 / 86

## 第三节 天命：历史盛衰的解读 / 91

## 第二章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社稷安危之本的认识 / 98

## 第一节 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 / 99

- 一、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意蕴 / 100
- 二、汉唐民本思想的发展 / 107
- 三、宋代民本思想的理性总结 / 112
- 四、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新特点 / 115

## 第二节 民本思想的多维思考 / 118

- 一、民本思想的多重价值 / 118
- 二、民本思想的时代局限 / 122